第一章
重庆战时军事指挥地位的确立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早在数千年前，这里就成为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进入封建社会后，它又长时期成为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特别是到了近代重庆开埠之后，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更是远远超过成都，因而也更为各方势力所青睐。1935年3月，作为当时国民政府负最高国防军事责任的蒋介石，在抵达重庆的次日，即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思想①。嗣后，随着蒋介石对四川、对西南重要地位的进一步认识，到1935年10月蒋介石离川前夕，即完全确立了以四川为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战略思想。

① 蒋介石：《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1935年3月4日），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编：《参谋团大事记》第866页，1937年7月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因此,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即移驻四川重庆办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所辖各部、会、署等也相继迁抵重庆，制定作战方针，直接指挥正面战场的对日战争;1942年初同盟国中国战区成立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兼任战区最高统帅，重庆的军事地位更一跃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心，战时重庆的军事指挥中心地位遂完全确立并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为止。

一、战前重庆的军事地位

(一)重庆的地理位置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它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重庆在地理上的位置，依据著名地质专家丁文江教授1930年在城内中央公园事务所的测定，大致为北纬二十九度三十三分三十四秒，东经一〇六度三十三分五十八秒；① 又据重庆市经济地理编辑委员会有关材料统计：在中国大陆今天的版图上，重庆实际上处于腹心地带，它距祖国的最东端、最西端分别为3186、3150公里，距祖国的最南端、最北端分别为2934、2925公里，②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自然地理上，重庆处于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居于川东南延伸的平行岭谷与川中丘陵、四川南部山地的结合部，是盆地底部较低的部份。重庆城区则座落在中梁山和真武山的丘陵地带，被长江、嘉陵江分割成三个部分，中心区又位于两江的汇合处。重庆城区这种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东出可借助长江水运直达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

①转引自彭伯通著：《古城重庆》第9页，重庆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②重庆市经济地理编辑委员会编：《重庆经济地理》（修订稿）第一册第3页，1985年5月版。

苏、上海等省市，并通联于世界各地；向西又可以通过长江、嘉陵江及其众多的支流，沟通与四川其他各地及贵州、云南、陕南、甘南等地的联系，从而成为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水道运输网的总枢纽，不但是控制川西、川北、川南的要冲，也是扼守云、贵、川、藏诸省沟通沿海的门户，在地理位置上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重庆城三面环江，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联，城区、江北、南岸三区，既各自独立，又互为犄角。在古代交通工具及攻城器械均十分缺乏与落后的情况下，西部两路口上的佛图关，海拔370米，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全城平均海拔为240米),为陆路入城的唯一咽喉要道。只要控制了佛图关，整个城区的防守就固若金汤。所以曾任明代兵部右侍郎的刘时俊在《驻军佛图关》一诗中写道：“军驻严关扼上头，凭栏百里望皆周。群山翠点高低列，两水清涵上下流。地险我何妨进退，城孤彼自受羁囚。一时纵目还生喜，釜底游鱼可待休。”①

重庆城重要的军事地位，还不仅限于它拥有三面环水之险，居高临下之势，而且还在于城的四郊，关隘林立，群山环抱。

邻近重庆近郊的江北、巴县等地，因地质及地势上的原因，形成了众多的关隘、峡谷，仅巴县境内，即有著名的关隘150余处，如城南的南平关、涂山、南山、黄山、文峰山等，城东南的黄桷垭、拳山垭，城东的亮风垭，城北的铁山坪、铜锣峡，城西的佛图关、二郎关、龙洞关、青木关、歌乐山、中梁山、缙云山等等，它们互为表里，互为犄角，步步设隘，层层拱卫，形成了防御重庆绝好的天然屏障。所以清乾隆《巴县志》在叙述重庆的军事地位时称：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渝州虽东川腹壤，而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山则九十九峰，飞拴攒锁于缙云、佛图之间。

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历代四川山水诗选注》第93页，重庆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昔人以地属必争，置重镇，间为制抚军驻节，良有以也。”又有“惟渝城会三江，冲五路，鞭长四百三十余里，俯瞰夔门，声息瞬应。而西玉垒，北剑阁，南邛峡、牂牁，左挟右带，控驭便捷。故渝城能守，可俾锦官风雨，坐安和会矣”的记载①。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在发布定重庆为陪都的命令中，对重庆也有“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的称誉。②

（二）战前重庆的军事态势

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具备的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得它成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历史上能够体现重庆重要军事战略意义的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西晋时王浚率大军由重庆东下灭吴与南宋末年余玠率部在重庆四周对蒙古军队的防御了。历史事实表明：在中华民族多次的统一过程中，重庆及整个四川均发挥了战略基地与粮仓的重要作用，为整个中国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国建立以后，重庆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性更为明显与突出，也更为各路政治势力所重视与青睐，从而成为四川乃至全国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舞台：“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是四川讨袁军的大本营，“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即设立于此并领导反袁斗争；“护国战争”时期既是北洋军队阻击护国军的前沿指挥中心，也是护国军志在必得的重要据点；“护法战争”开始后，重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政治地位一度成为“护法军政府”的活动中心，非常国会参议会议长林森、众议院院长吴景濂，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参谋长李烈钧等及国会议员70余人均曾相继抵达重庆并在此活动。

① 转引自彭伯通著，《古城重庆》第11页。

② 《大公报》1940年9月6日。

五四运动后，重庆又是川东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大革命时期，重庆成立了四川第一个共产党省委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并成为领导全川革命活动的指挥中枢，也是四川一系列重大活动的发源地与活动地——重庆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对北京“三·一八”惨案、万县“九·五惨案”的声援，以及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无不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中共重庆地委所属军事委员会还在重庆领导发动了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泸顺起义，给四川军阀以沉重打击。

重庆“三·三一”惨案后，虽然四川军阀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残酷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但在重庆的中共地下组织仍是“前仆后继”地斗争着，广大人民反抗暴力的斗争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潼南双江镇暴动、合川兵变、江津起义等武装反抗国民党及四川军阀统治的斗争，汇成了重庆光辉灿烂历史中的耀眼一环。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开展，重庆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求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吁请四川军队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经久不息，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重庆人民的觉醒，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奠定了思想、理论与心理基础。

当1920年10月刘湘以“川军前敌总司令”的身份进占重庆后，重庆即成为刘湘经营个人势力，以称霸四川的指挥部、活动中心与战略据点。这期间，虽然也有其他军阀部队（包括外省军阀）为染指重庆与刘湘进行多次战争并曾打败刘湘。但刘湘对重庆的“痴心”始终不改，他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手段，或联甲攻乙，或联乙攻甲，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先后打败曾占据重庆的杨森、袁祖铭等部，并将其“川康边防督办公署”“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等由成都迁至重庆，从而建立了对重庆的牢固统治。刘湘还凭借重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富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联合四川其他军阀，通过发动“二刘之战”，打败刘文辉，将自己的势力由重庆扩展到整个四川，进一步巩固了其“四川王”的地位。到1935年初参谋团入川前夕，重庆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刘湘手中，以至当1935年2月新的一届四川省政府成立时，刘湘一改先前省政府设于成都的惯例，将新的四川省政府设于其老巢——重庆。

参谋团入川后，国民党中央势力开始渗入重庆并以重庆为据点，向四川及西南各省大肆扩展。为了控制重庆这个军事上的重镇，扫除“军令”“政令”执行中的障碍，减轻地方势力的干扰，国民党中央频频给刘湘施加压力，要其将省政府迁成都。迫不得已，刘湘只得于1935年7月将省府由重庆迁至成都，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盘踞了十余年的重庆老巢。

四川省政府迁离重庆后，刘湘所部独立第161师许绍宗部仍留驻重庆，重庆市警察局等地方军警机关也在刘湘控制之下，因此，刘湘在重庆仍保有一定实力。到1935年8月初，刘湘在国民党中央的压力下，不得不电令许绍宗部开出重庆城，专负维持下川东各县秩序与防务之责，使其在重庆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同年11月重庆行营成立后，负责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包括薛岳、李抱冰、万耀煌、徐源泉、周浑元、上官云相、郝梦麟、吴奇伟等军，其实力无论在人数、装备上，都远远超出刘湘川康绥靖公署的所有部队。不久，国民党中央军第16军军长李蕴珩、第36军军长周浑元率所部相继驻防重庆，其他中央各机关也纷纷在重庆设立、派驻分支机构，从而使得重庆的政治、军事、经济、人事等一切大权、均牢牢地控制在代表国民党中央的重庆行营之手。

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原参谋团对川康各军进行整编的基础上，再次于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此次会议不仅将川康各军的建制、数量大大裁减、合并，使川康各军由先前的8个军26个师171个团，整编为7个军21个师105个团，而

且将川康各军直接纳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控制之下，作为川康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只有在呈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意之后，才有权指挥调动所属部份军队。除此之外，凡有关军队的经理、卫生、人事任免、部队训练、政治教育以及其他所有有关军事的航空、防空、军需工业、兵器制造业等，均收归于国民党中央有关部会，或由委员长重庆行营代为节制与指挥，从而在军事指挥上给川康各军以极大的约束与节制，也使得国民党中央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川军国家化”的愿望得以实现，其对重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控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8至9月，整理甫毕的川康各军即源源不断地开赴抗日前线，直接参加对敌作战。随着川军的大批出川，国民党中央势力则纷纷涌入川内，这就为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的顺利迁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事实表明：自国民党中央迁至重庆办公后，尽管川局曾出现过一些波澜，但整个四川在抗战时期则始终是安全的、稳定的。

（三）参谋团进驻重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表面上获得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既不全面，也不彻底，更不巩固。名为中央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所及的只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广东数省及上海、南京诸市，其它各地则大多为各个地方势力及大大小小的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张作霖、阎锡山、刘湘、龙云等控制。为了消除此种局面，实现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打着“统一”的旗号，采用种种手段与各个地方军阀进行了近十年的混战。中国共产党决定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并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后，蒋介石更视其为“心腹大患，”全力以赴地进行武力围剿与残酷镇压。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中央仍企图将其势力伸入动荡不安的四川。

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分别委任握有实权的四川军阀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

军军长，刘湘为21军军长，赖心辉为22军军长，刘文辉为24军军长，邓锡侯为28军军长，田颂尧为29军军长。①并多次派人到四川对这些军阀进行欺骗、煽惑、鼓动与拉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国民政府多次下令改组、整顿四川，但毫无收效，各个军阀间互不统率，动辄以兵戎相见的局面并未得到改变。

1928年11月7日，国民政府又发布命令，以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希冀二刘能各自负起军事、政治方面的责任。为配合此令的推行，国民党中央又于第二天(即11月8日）颁布《整理川政令》，对整饬四川的军政、民政、财政、教育、民团、司法等提出了具体目标与详细计划，并“厚望”新一届的省政府能对“所令各节，事在必行，不容丝毫敷衍”,并“急起直追”,以“解川民之倒悬,致川政于上理。’②但该命令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新的省政府直到1929年3月22日才呈报成立，省外各委员，也以川局复杂，形势恶劣而不返川就职。至于军政方面，不独防区制未能打破，军队未能裁削，且各个军阀更是变本加厉，剑拔弩张，相互火并。迫不得已，国民政府于1931年2月27日再颁命令，仍以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另委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并规定“所有四川各军，归该督办全权编遣。’⑧

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这些命令，对于“山高皇帝远”的四川军阀来说，无异于一纸空文，他们仍我行我素，大肆扩军备战，为更大规模的战争作准备。对此，国民党中央虽有不满，但又鞭长莫及，无可奈何。这种情形直到1934年底参谋团入川才开始出现转机。

①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2页。
②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第390页。
⑧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第436页。

1932年底至1933年初“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安和四川军阀的惊慌失措。但此时蒋介石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江西中央红军方面，还无暇也无力顾及四川，他所能办到的，只是在舆论上、财力上、械弹上对四川军阀进行鼓动、煽惑与支持，企图借四川军阀之手剿灭红四方面军。为此，他先后任命29军军长田颂尧、21军军长刘湘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命其统率所部，全力进剿红四方面军。但无论是田颂尧的三路进攻，还是刘湘的六路进攻，结果均以惨败告终。兵疲、力乏、财困的刘湘，在走投无路之下，于1934年11月13日东下南京，向国民党中央乞援，要求：“（一）请中央派大员入川，统筹剿匪大计，川省各军在蒋委员长指挥之下，限期剿灭赤匪。（二）川省庶政亟待整理，如何打破防区恶习，组织强有力之省府，渐纳川政于正轨，此盖有待于中央力量之统驭。”①

在蒋介石方面，则认为刘湘主动乞援，是国民党中央插手川政的绝好时机。因此，刘湘抵南京后，蒋介石对之极为亲热，曾4次会见刘湘并与之商谈四川军政诸问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等国民党要员，也多次与刘湘会晤，就四川军事、民政、财政等问题进行讨论。在各有所图、互相利用的前提下，刘蒋双方在中央军入川协剿红军、改组四川省政府、补助四川财政、整理四川金融诸方面迅速达成协议：蒋介石派兵入川追剿红军，帮助刘湘统一四川并保证他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刘湘则打开自民国以来即关闭未启的四川门户，允许蒋介石的中央军、行营参谋团及别动队入川，以统筹、指挥、督促剿匪军事。

1934年12月21日，也即刘湘返抵重庆的第三天，国民政府明

①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第554页。

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免去刘文辉的四川省政府主席职，重新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其他省府委员也完全重新任命。与此同步，国民党中央军也奉令陆续进入四川， 12月1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派军队入川，其中：“ （一）派山炮营赴渝，归刘湘节制。（二）命第一师胡宗南部接防昭化、广元。（三）令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合为一路，由上官云相指挥；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经竹山，竹溪集中平利、、安康、岚皋待命；四十七师、五十四师由洵阳前进，经紫阳联合向万源推进。”① 12月19日，蒋介石任命贺国光、杨吉晖为行营驻川参谋团正副主任，并令其尅日组团，迅速入川； 12月29日，参谋团正式组成，并由贺国光、杨吉晖亲自率领，从南昌乘船，昼夜兼程地向四川奔来；1935年 1月12日，参谋团一行数百人抵达重庆，由康泽率领的别动队2000余人也同时随参谋团抵达重庆，国民党中央军数万人也正行进在由汉口西上四川的途中。从此，国民党中央势力进驻重庆并逐渐渗透到四川的各个部门、各个角落，四川也因此结束了其自民国以来的半割据状态，开始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和控制之下。

参谋团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其内部组织机构设有主任、副主任及秘书、第一处、第二处、政训处、总务处、高级参谋、督察专员、副官、电务员等，除主任、副主任由贺国光、杨吉晖担任外，第一处（负责军事）处长王又庸、副处长李为纶，第二处（负责政治）处长刘倚仁，副处长萧霖，政务处处长康泽，总务处处长柏良。 ②根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的规定，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运筹指导督察的特设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甲、运筹剿匪作战计划。乙、指导剿匪各军军事行动。丙、维系各军之间密切联络。丁、督察各

①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第557页。
②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第558页。

军对于剿匪之勤惰，审拟奖惩，呈请委员长核示遵行。戊、考核各军之械弹分配与消耗情形，及剿匪军费之支用，查考经理卫生情报事宜。己、搜集诸种情报，随时向委员长呈报。庚、督促并指导与剿匪攸关之政治设施。”而作为参谋团最高长官——贺国光的责任是：“主持团务，处理剿匪一切事宜，并协助四川剿匪总司令行使职权，当委员长未在行营时，关于作战命令，应由主任拟定，四川剿匪军总司令代行。”①

由此可见，参谋团成了代表蒋介石发号施令，指挥监督四川军政、民政、财政的全权机关，是国民党中央势力渗入四川乃至整个西南的第一步，重庆也由此成为国民党中央控制四川及西南其他各省的指挥中心与前沿阵地；而别动队对四川基层政权的渗入与控制，参谋团对四川军队的初步整理，则为国民党中央进一步控制四川创造了条件。

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渝与重庆军事指挥中心地位的确立

（一）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的根据地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中心和社会活动中心，是政府的首脑机关所在地，这就要求首都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军事位置、经济状况等自然条件，必须要优于全国其他各地，除此之外，首都还必须拥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和人事关系，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正因为首都的这种特性，所以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前即指定了具有山地、水地、平原三要素，历来被称为“龙蟠虎踞”之地的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都，并于1912年1月1日在此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①王廷科：《参谋团入川纪实》，载《重庆文史资料》第25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职。同时孙中山也认为，“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因此他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陆都。”[①]民国成立后，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莫测，作为一国之都的首都也频频变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打着“继承总理遗志”的旗号，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仍设在南京。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以南京为国民政府之国都，的确在对外战争中存在着种种弊端与不利。因此，当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即立刻意识到日本此举“系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胁。”[②]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保证国民政府得以独立、自由行使职权，国民政府于1月30日发布《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移驻洛阳办公。嗣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叙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动机与目的时称：“因为日本一方面以海陆空军猛攻上海，一面派大批军舰开到南京，其目的在威逼政府签字于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事机是非常危急，如果错过了，则将至挽救不及，所以我们即日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放在安全的地位，以便自由行使职权。”[③]

事实表明：设于南京，靠近上海的国民政府，一旦对外战争爆发，在敌人强大的空军、海军和炮火的攻击下，毫无坚守之条件与希望。如果国民政府不想与敌人作城下之盟，不想在对外战争中屈辱求和，那么，迁都及设置陪都就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因此，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就将“我

①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9页，群众出版社1992年3月版。

②《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宣言》(1932年1月29日)载《中央周报》第191期。

③ 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所致开幕词。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4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都”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视此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①会议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以及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和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根据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态势，讨论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提议案并作出了“(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的重要决议。②

虽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最先将选择陪都、行都的着眼点放到了西北和中原地区并开始对陪都西安进行筹划与营建，但那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在全国建立其真正统治时所作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抉择。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下，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这一严酷现实，中国四面八方中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沿海地区不能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缘由已显而易见，而西南诸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各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与割据之中，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很不稳定。在广大的中国版图内，能够牢牢为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就只有中原和西北地区了。尽管如此，但将西北地区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所在地，则是不理想的。因为西北地区既贫穷落后，不利于众多人员的物资供给与生活消费，又同样容易受到日本强大武力的威胁与攻击；而且西北地区接近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对于当时尚未完全与苏联政府恢复外交关系，长时期坚持反苏反共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其所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此外，作为西北最大省份——新疆统治

①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所致开幕词。
②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56页。

者的盛世才，也一直未被国民政府所控制，而且是变乱无常，这对国民党中央来说，亦无疑是一块心病。因此，将中国的战时首都选择在西北，的确是不理想的，用蒋介石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即使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但“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①所以，要下定与日本最后作战的决心，就必须重新寻找一个比洛阳、西安更为安全且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来作为战时政府首脑机关及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据地。为此，作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专负军事防御、国防部署之责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从1934年秋开始，用一年多时间，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十余个省份进行巡视、考察、分析与研究，以图完成此项重任。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偕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人从武汉飞抵重庆，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蒋介石这次西南之行的主要目的，首先固然在于追剿红军和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另一方面，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寻觅、策定国民政府的最后根据地，也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蒋介石一到重庆，就表现出与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兴趣和态度。

3月4日，蒋介石在出席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作的他到四川的首次讲演中，就大张旗鼓地阐明、强调了四川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性，并公开、明确地表明了他自己对四川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而所有这些，则是他中原、西北之行中根本没有的。蒋介石在这篇名为《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演讲中说：

“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

① 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载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3页，1974年出版。

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那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然有了这种优越的凭藉，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功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我们无论从历史的事实来证明，或从四川在全国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四川的治乱，确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危。所以要统一国家，完成革命，必须四川同胞先来负起这个责任。如果四川同胞不能负起革命责任来尽力于革命事业，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更没有完成之一日。”①

嗣后，蒋介石来回穿梭于贵阳、昆明、重庆和成都各地，随着他在西南诸省逗留时间的延续，也随着他对西南诸省地势、气候、矿藏、物产、民风民俗以及人民意愿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还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撤出四川，更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对西南三省的深入渗透以及对该三省政治、经济、军事控制的加强和巩固，蒋介石对西南三省特别是对四川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四川为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也于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且越来越坚定并在他离开四川之前完全确定了下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的讲演，再次强调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的密切关系，第一次明确公开地提出了四川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的思想。蒋氏还认为，“四川之治乱，即中国兴亡之关键，今后四川决不可乱，一乱国家就要亡。”②

两天之后，蒋介石在成都作的另一次题为《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的讲演中，更充分、全面、明白、肯定了四川在未

①蒋介石：《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1935年3月4日），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编：《参谋团大事记》第886页，1937年7月版。

② 《蒋委员长训话：建设新四川之根本要道》，载《政训半月刊》1935年4—5期。

来对外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

“现在我们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讲，中国的精华——国家生命的根基是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不能统一安定，无论是华北或华南都不能统一安定。我们四川既居长江上游，又是本部各省之中拥有最广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与最好的形势之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乱，不但影响长江流域的治乱，而且可以定整个国家的治乱。……我们要真正订大计划，亦要待统一，至少长江流域能够统一。如果长江的首都——四川不能统一安定，新的国家无论如何建设不起来！所以今后治乱国家的兴亡，根本还是要看我们四川如何？ ……所以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 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①

在这里，蒋介石既强调了四川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分析了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最后，蒋介石明白无误且又自负地宣告：在对日战争发生后，无论中国的东北、华北及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遇何种困难，但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②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

①② 《总裁讲演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载叶育之著：《四川史地表解》1941年成都出版。

立了下来。

为经营、建设四川根据地，蒋介石为之确立了“改革四川的政治，整顿四川的军队，转移四川的风气，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的建设方针，而所有这些，经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筹划、指挥与督促，在四川地方政府与军队的配合协助下，在全川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都得到了实施并于抗战发生前夕取得相当成效，从而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在组织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军事抵御的同时，开始着手迁都重庆的各项准备工作。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即手令国民政府“各院部令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并限三日具报。”奉此，行政院召集所属会商决定：关于迁地办公：1.第一步各机关办公地点疏开，即假定敌机轰炸或敌舰开炮时，各机关在城内或外，准备民房秘密办公，并先登记负责人和号码，以资联络。2.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如衡阳）。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① 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扩大，国民党中央也越来越重视战争对首都的威胁、影响及其应取的对策，并开始将先前的迁地办公提高到一个新的战略决策的高度。

到 8 月 13 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也最终下定了将首都迁到四川重庆的决心。所以，当“八·一三”沪战爆发的当天，蒋介石即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面陈的“建议中央迁川’的意见；“甚表嘉许”。② 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政府的一些高级幕僚如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嘱何

①《芦沟桥事件第十七次会报》，载《民国档案》1987 年第 3 期。

②（台湾）刘航琛口述、章君毅执笔，《戎幕半生》(二十二),载台湾《新闻天地》，1967年12月 2 日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